

章传家 颜晓峰 主编

民族复兴之路

的回望与思考



人民出版社



章传家 颜晓峰 主编

民族复兴之路

的回望与思考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侯 春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复兴之路的回望与思考/章传家,颜晓峰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01-008292-9

I. 民… II. ①章… ②颜…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934 号

民族复兴之路的回望与思考

MINZU FUXING ZHILU DE HUIWANG YU SIKAO

章传家 颜晓峰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25

字数:315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8292-9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醒 悟 篇

第一章 民族复兴理论武器的比较和选择	(2)
一、“拜上帝教”的迷失	(2)
二、“尊孔复古”的碰壁	(6)
三、“三民主义”的局限	(9)
四、马克思主义被选择为民族复兴的理论武器	(13)
第二章 民族复兴根本路径的比较和选择	(18)
一、太平天国的败亡	(18)
二、洋务运动的破产	(22)
三、戊戌变法的夭折	(26)
四、辛亥革命的失败	(29)
五、社会主义被选择为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	(33)
第三章 民族复兴领导力量的比较和选择	(38)
一、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38)
二、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局限性	(41)
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局限性	(44)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	(47)
五、工人阶级政党被选择为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	(51)

奠 基 篇

第四章 扫除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障碍	(56)
-------------------------	--------

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56)
二、实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	(60)
三、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空前统一	(65)
第五章 奠定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基础	(70)
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70)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76)
三、确立社会主义基础工业体系	(83)
第六章 铸就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优势	(90)
一、铸就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90)
二、铸就爱国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	(94)
三、铸就独立自主这一伟大民族性格	(100)

跨 越 篇

第七章 从普遍贫困到实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06)
一、极左政策下的普遍贫困	(106)
二、快速发展的“东方奇迹”:跨入小康社会	(112)
三、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里程碑	(117)
第八章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跨越	(124)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和严重弊端	(124)
二、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创举	(134)
三、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体制优势	(142)
第九章 从闭关自守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148)
一、封闭半封闭的深刻教训	(148)
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拓展	(151)
三、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	(163)
第十章 从偏重人治到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跨越	(167)
一、千百年来人治遗产的深广影响	(167)
二、确立和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170)
三、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保障	(177)

第十一章 从轻视知识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性跨越	(183)
一、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历史遗憾	(183)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新风	(187)
三、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92)
四、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支撑	(195)
第十二章 从僵化保守到举国焕发创造活力的历史性跨越	(200)
一、本本主义盛行的历史僵局	(200)
二、改革开放中人们获得新的解放	(204)
三、努力形成激发社会活力的创业机制和创业环境	(207)
四、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力量源泉	(210)

凝 思 篇

第十三章 高扬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旗帜	(21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旗帜	(216)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旗帜	(220)
三、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24)
第十四章 扩充实现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	(232)
一、立足基本国情,把经济建设摆在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位置	(232)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建设注入强大生机和活力	(235)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41)
第十五章 优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生态	(251)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华民族赖以复兴的政治生态	(251)
二、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258)
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政治文明水准	(261)
第十六章 振奋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267)
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267)
二、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270)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275)
四、弘扬中华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79)

第十七章 加固实现民族复兴的安全保障	(285)
一、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有强大的国防提供安全保障	(285)
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290)
三、着眼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 ...	(296)
第十八章 强健实现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	(304)
一、实现民族复兴,关键在于把党锤炼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304)
二、突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307)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314)
后 记	(318)

醒 悟 篇

第一章 民族复兴理论武器的比较和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发觉自己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进而奋起直追。西方的坚船利炮冲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国外的思想和学说纷至沓来,有识之士亦提出了各种理论和方案,试图引导中国迈上救亡图存的道路。然而,这些理论在历史上虽然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们始终没有帮助中国人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被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为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理论武器,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大道。

一、“拜上帝教”的迷失

“拜上帝教”是洪秀全、冯云山创立的宗教形式的农民斗争组织。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动了古老的东方封建帝国,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主权不再完全独立,传统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传教士的精神侵略也扩大起来。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生存维艰,洪秀全等把西方的基督教改造成中国化的拜上帝教,并以之为手段组织和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一) 拜上帝教的创立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黄埔条约》传教权的获得,基督教教士们便以征服者的姿态在中国公开活动,不仅传教而且培养华人牧师。如梁发即是接受马礼逊的洗礼成为第一个华人牧师的。他依据《圣经》编了为殖民地政策服务的《劝世良言》一书,洪秀全正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而创立了拜上帝教。

出生于1814年广东花县的洪秀全,第一次遇到《劝世良言》是在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考后闲游期间,但当时并未引起他的注意。然而屡考屡败的经历使其日渐体会到政府的腐败、人民的疾苦,其读书科考、光耀门庭的思想逐步转化。洪秀全屡试不第并非文才有亏,而是腐败的考政造成的。当时考试须有人作保,洪秀全祖孙三代皆农民,寻找一个体面、具有功名的人作保十分困难,而且考官徇私舞弊案件层出不穷,出现了“形同残废,步履甚艰”的满洲贵族子弟,经考官“瞻循情面”考中武进士的怪事。这样黑暗的考试,正是吏治腐败、封建统治日趋衰落的征兆和反映。

洪秀全在第三次落第之后的言行异常,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反感。他常梦语“皂袍老人斥责孔子”,曾见人便喊“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以及“斩妖”等。这说明了洪秀全对孔子的信仰初步发生了动摇。到了第四次最后一试,仍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时,他十分愤懑,大声叫喊:“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叛逆之心涌上心头。此时,他偶然听说《劝世良言》是非常之书,才仔细阅读了7年前就已得到的这本书。

《劝世良言》劝人敬拜上帝以拯救灵魂,信仰上帝的人,灵魂升入天堂,不信仰上帝就会下到地狱。洪秀全看到这里面隐含的“独一真神上帝”、“人皆兄弟”以及“天堂”观念与自己对现实的反抗意识、与苦难中国人民的追求和向往合拍,于是决定奉行此教。针对信仰诸神而不能脱离苦海的劳动人民,开始了劝人“拜上帝不敬邪神”的创教和传教活动。当然随着对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思想愿望的进一步了解,他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革命理论的外衣”。

(二)农民革命理论的“外衣”

1843年洪秀全把村塾中的孔子牌位除去作为“敬拜上帝,不敬邪神”的表现。这在孔教盛行的天下无疑是触犯大忌的革命表现,遭到当地士绅的不满。他和冯云山只好离家远出,来到广西贵县赐谷村进行“敬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地狱”的说教,树立了拜上帝的权威,从而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传播真道”、“启迪英雄”的立足点。而后,冯云山到紫荆山区进行传教、发展会众的斗争,而洪秀全则回乡以教书为掩护进行传教活动,在此期间他写下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百正歌》劝人崇正黜邪。《原道救世歌》宣称“天父上帝为独一真神”，劝人“须做正人”，反对“淫”、“忤父母”、“为盗贼”、“为巫”、“赌博”等6种不正行为及“食洋烟”、“好酒”、“堪輿”、“相命”等恶习陋俗，把儒家推崇的尧、舜、周公、孔子、颜回等作为“正人”的典范，把桀、纣、黄巢、李自成列入不正的代表，反映了西方宗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结合。《原道醒世训》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僵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①。可见洪秀全利用基督教中“人皆兄弟”的博爱观，批判了现实中的等级差别，提出了用平等原则改造社会的主张，这集中了中国农民要求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大同社会的强烈愿望。《原道觉世训》对基督教“独一真神为上帝”的教义作了新的解释，把皇上帝树立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耶稣由上帝的独子变为长子，洪秀全自己成为上帝次子，此外还有众多的儿子和家庭成员。这样洪秀全把自己放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在“天父”、“天兄”指令下去斩妖杀魔，建立人间天堂。他还强调皇上帝和阎罗妖的对立和斗争，说清朝是“蛇魔”，咸丰是“阎罗妖”，是“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这篇文章表明拜上帝教已成为洪秀全反清的工具。

1847年，洪秀全把基督教的教条和仪式，根据起义的需要，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加以改造，创制了拜上帝教的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用来组织群众，维持起义纪律。他又利用“独一真神皇上帝”的一神排他性，把分散的小农统一到一面旗帜之下，形成一支集中的力量。这些理论为即将到来的农民大革命提供了指导思想的准备工作。洪秀全把西方的原始基督教义和中国儒家的道德观念、大同思想以及农民的反抗思想糅合在一起，使拜上帝教成为“革命理论的外衣”。正是打着这面宗教旗帜，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聚集起来，形成了太平天国运动这股强大的革命洪流，极有力地冲击和动摇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三）农民政权专制统治的“光环”

拜上帝教宣称皇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人世间的贫富贵贱、死生祸福，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自然界的雷电，无一不是皇上帝精心安排的。洪秀全充分

^① 《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页。

利用他自己创造的上帝,凭借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名义,形成了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太平天国”为号的政权。但革命政权建立以后,洪秀全继续并空前地利用拜上帝教,企图达到巩固政权、发展天国事业的目的。显然错综复杂的现实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不可能因皇上帝显灵就得到解决,相反地,倒是皇上帝俘虏了洪秀全,使天国的事业止步不前,甚至倒退,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拜上帝教演变成“君主专制的光环”。

洪秀全从永安封王时就逐步退居幕后,一切军国大事统归杨秀清节制。到了南京,更是“僻处深宫,从不出户”,即使昔日情同手足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求求见,也必须请旨拟订方可。胜利的取得使洪秀全忘乎所以,他认识不到是千万战士的艰苦奋斗换得了这种局面,却把这一切归于皇上帝的恩赐,“天命归予”的思想表明拜上帝教已成为精神的鸦片烟,麻醉了洪秀全。

洪秀全在天京城里过着“琵琶鼓乐箫来和,金玉堂中快乐多”的君主生活,并且写了充满封建纲常思想的《天父诗》、《幼学诗》,俨然一位标准的专制君主。当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逼封万岁”时,洪秀全密诏韦昌辉把杨秀清杀死,几万兄弟也被残杀。不久韦昌辉被处死,石达开也因遭洪秀全的疑忌而率10万精兵出走。天京事变使革命元气大伤,“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宗教神话被自我戳穿,终至“人心冷淡”、“锐气减半”。太平军中流行起“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回转故乡仍旧做长工”的歌谣,表明作为太平天国立国精神支柱的拜上帝教已经在人们心中严重动摇,太平天国由此转向衰落。

为了修补被内讧毁掉的“宗教长城”,洪秀全在宫中仍不知疲倦地从事宗教文字游戏,说“天话”、“梦语”,执迷于“天情”,写诏书,让人们相信他是受到上帝、天兵天将保护的。还把国号一度改为“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反复宣传“爷哥朕幼,父子公孙,同坐天国”。总之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帝的再次显示奇迹。拜上帝教已把此时的洪秀全麻醉得完全沉溺于逃避现实的幻觉之中,这种宗教迷信的恶性膨胀,必然导致军事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倒退,万事“靠时于天,不肯信人”。

在军事形势十分吃紧的日子里,洪秀全用了很多时间去批注“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又让洪仁发、洪仁达写了“王长次兄亲眼亲耳共证福音书”。仅1861年2月17日到5月16日短短的三个月中,就连发了五道阐发

“上帝真道”的诏旨。目的就是要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万能的；他的确是上帝的第二子麦基洗德转世，奉上帝御旨，下凡救世，以为只要证明了这些，将士们就会去拼命作战，江山就会巩固。后来天京被湘军包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他却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没有兵将，他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他就以这些痴人说梦般的胡话，坚决拒绝了突围的建议，终于导致身死国亡的大悲剧。

拜上帝教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洪秀全为了拯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而对西方基督教改造的结果，对于动员和组织人民起来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拜上帝教毕竟是一种不科学的世界观，以之指导的革命实践必然不能正确有效，最后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二、“尊孔复古”的碰壁

辛亥革命后“尊孔复古”思想逆流泛滥，这一方面与康有为、陈焕章等孔教会之徒的鼓吹有关，另一方面是袁世凯为配合其帝制复辟阴谋而以政权力量大肆尊孔所致。

（一）孔教会“尊孔复古”的鼓吹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一贯反对民主共和的康有为就发表《共和政体论》、《救亡论》等一系列文章，宣扬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辛亥革命后一时出现的混乱局面更使他痛心疾首，断言革命会导致“国危民悴”、“纪纲尽废”的“暴民之祸”。如何来消弭革命所产生的后果呢？康有为等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尊孔复古，扶翼圣道，恢复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仪、法度。1912年10月，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推康有为为总会长，先后创办《孔教会杂志》、《经世报》、《不忍》杂志等作为宣扬尊孔复古的舆论工具。

孔教会成立后，曾两次向国会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为教主，用孔孟之道规范全国人民的思想。康有为甚至主张要制定一套繁琐的宗教仪式，让人们在孔子像前顶礼膜拜。认为中国人文化程度太低，不能实行共和，“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逾墙飞瓦也。若夫未行立宪而超

入共和,则是小儿幕飞船之悠扬天空而遽欲学焉,未有不颠坠而死者矣。”^①这位当年鼎鼎大名的维新志士已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堕落为复古倒退的祖师了。但我们如果联系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凭借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孔子改制”,笃信的是循序而行的庸俗进化论,那么,其思想的倒退也就不难理解了。

康有为、陈焕章等人主要是害怕革命而主张尊孔复古,另一些封建余孽,如劳乃宣之流则完全是为了复辟帝制而鼓吹尊孔复古。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著《共和正解》,歪曲共和,混淆君主政制与共和政制的区别。1914年,劳乃宣又抛出《续共和正解》,极力主张要尊孔复古,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他把纲常名教称之为“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甚至要求袁世凯还政于清室,主张清帝复辟,结果触到了袁世凯的痛处,遭到袁的申斥。然而,不论康有为还是劳乃宣,他们极力主张尊孔复古的思想却符合袁世凯独裁统治、帝制自为的野心,于是袁世凯乘机以政权力量煽动尊孔复古,致使这股思想逆流更加甚嚣尘上。

(二)袁世凯对“尊孔复古”的褒扬

孔教会成立后,立即得到袁世凯政府的批准和赞扬。1913年初,袁世凯发布《整顿伦常令》,称孔子之道在世界上“莫与伦比”,不久,又颁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下令各地学校恢复尊孔读经。此后,宣扬尊崇孔孟之道的政令,接二连三地袁世凯政府中抛出,强制推行尊孔活动。1914年9月,袁世凯还亲自率领百官,去孔庙举行祀孔跪拜大典。12月,又到天坛举行祭天仪式。在袁世凯政府的鼓动下,各种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孔社、大成社、洗心社等尊孔团体纷纷出现,各地的祭天祭孔活动也搞得热火朝天。

袁世凯支持尊孔复古活动是为他阴谋黄袍加身、帝制自为开辟道路的,正如鲁迅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

^① 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九)(康南海文集)》,宏业书局1976年版,第217页。

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①,深刻地揭示了尊孔复古与帝制复辟的内在联系。

同时,辛亥革命后尊孔复古思想逆流的泛滥,与帝国主义的鼓动也有关系。康有为、陈焕章组织孔教会时,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跑到孔教会发表演说,宣扬定孔教为国教大有好处,还大力鼓吹基督教与孔教必须“互相辅助,以谋人道之乐利”。英国驻威海卫行政公署长官庄士敦不仅捐款加入孔教会,而且公开宣称中国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进于善良矣”。沙俄贵族盖沙令也极力主张中国需要复兴孔子圣道,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倾倒”,企图以孔教来反对革命,消弭革命。

在一片尊孔复古的鼓噪声中,袁世凯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分别抛出《共和与君主论》和《共和宪法持久策》,公开为袁世凯的帝制鸣锣开道。古德诺主张“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有贺长雄则以日本行君主立宪制而富强为据,公开主张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杨度、孙毓筠等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借口研究共和是否适合国情问题,通电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他们援引古德诺的观点,认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杨度还为此抛出洋洋万言的《君宪救国论》,宣扬“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②,认为首立君主,再求立宪。

(三) 民主主义思想的反击

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蔚然成风,民主主义思想之根已经深植于中国社会,决不能容纳尊孔复古思潮。

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华新报》上深刻揭批袁世凯尊孔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不过借祀孔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辟之实”,其反动伎俩比西汉王莽假托周礼篡汉自立,真正要“更妙十倍”。^③ 有一篇《孔教非宗教论》的文章指出,袁世凯将“孔教”抬到“国教”的地位,无非是出于复辟帝制的反动目的,所谓“阳为孔教,阴具诡

^① 《鲁迅杂文精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② 金山、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5年版,第188页。

^③ 转引自张艳国:《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谋”，“鸿门舞剑，意在沛公”。章太炎发表《驳建立孔教议》，明确指出中国素无国教，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否定了所谓“孔教”，因此“定孔教为国教”更是无稽之谈了。他指出，虽然中国历史上没有孔教，也没有作为孔教教主的孔子其人，但是，中国世代尊奉孔子，尊奉的只是历史上的孔子，肯定和怀念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所作的不朽贡献。

批驳反动的“中国特殊国情论”，揭穿尊孔复辟阴谋。尊孔复古分子捏造的“中国国情论”，成为中外反动派鼓吹帝制复辟、反对民主共和的工具。在《国情》一文中，李大钊指出，以外国人所论的“中国国情”为政治设计的基础，是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国情搬到几千年后的近代社会。陈独秀指出，将国情定格于数千年封建主义传统之上提倡尊孔读经，鼓吹复古复辟，实际上是要阻碍现代文明的发展，阻止中国社会进步的进程。他认为，“尊孔”乃专制复活之先声，拜古是中国进步的障碍，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总之，民国初年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它所反映的是社会文化领域里新旧思想的冲突；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它所反映的是政治领域里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的政治拼杀。在中国辛亥革命后，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反动派，借用文化传统为复辟清朝、复辟帝制服务——它演出的并不是“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而是对抗进步文化的反动逆流，是开历史倒车的闹剧、丑剧。这说明，通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任何人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明目张胆地复辟帝制，都已为人民所不容；但同时也说明，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三、“三民主义”的局限

三民主义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制定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包括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方案，以求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所面临的独立、民主、富强三个主要课题。随着中国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更替，它也由旧三民主义演变发展到新三民主义。

（一）旧三民主义

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在入会誓词中，他提出“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初步表达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成立同盟会,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同年,孙中山在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写的《发刊词》中,首次将这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鲜明地揭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此后,三民主义在其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比较完备的民主革命纲领。

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反满,实行民族革命。但是,反满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大汉封建帝国,而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口号将各阶级、阶层的人民会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组成推翻清朝政府的政治力量。但是,旧民族主义没有也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只是把反满作为主要对象,反帝则包含在反满任务之中,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更不是把它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没有把矛头对准当时的主要敌人,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民族主义的根本缺点。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赋予民主革命以比较完整意义。民权主义的中心目标和基本内容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完成所谓政治革命。封建专制制度是“恶劣政治的根本”,是造成国家纷乱和分裂的重要原因。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采取革命暴力的手段,才能建立一个“平等”、“民治”、“国民”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民权主义是进行民主主义启蒙的有力武器。但是,旧民权主义缺乏深刻的、明确的反封建内容,没有提出一个彻底的民主纲领,因而未能扫除封建暴政的社会基础。由于这个原因,孙中山虽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行了很大努力,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始终行不通。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他一生向往祖国的繁荣富强,因此,解决民生问题是他经常考虑和执著追求的重要课题。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与对立,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解决“农民”这个中国的“重大民生问题”,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基本途径就是“平均地权”。具体办法就是“定地价”和“土地国有”。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每亩征税,又可将土地随时收归国有。这样既解决了地主利用土地垄断经济,又可促进工商业发展。民生主义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土地的强烈愿望,它力图解放农业生产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它的民